

在典範移轉的時代中學習永續發展

永續願景的最終力量在人民，應致力以「新環境典範」取代「主流社會典範」

文 / 李永展

永續發展的民間力量

二〇〇三年中，時報文教基金會受教育部委託，在全省舉辦五場「永續發展教育論壇」，由於這是游院長宣示二〇〇三年為台灣「永續元年」以來，首次在全省民間舉辦的說明會，因此責任顯得格外重大。

籌備初期我們即動員全省特派蒐集資訊，並和當地實際參與推動各面向永續議題的民間團體取得聯繫，同時也邀集專家學者和當地政府首長共同參與，並且為這次會議訂出三大目標：首先，要清楚說明並推廣永續發展的概念；第二，要彙整地方實際的成功案例和推動團體的意見；第三，要提出未來永續發展的具體建議。

在宜蘭、台中、台南、桃園、台北舉行的五場說明會已圓滿落幕，與會者均深切體認到，推動永續發展的難處在於不只要顧及當代人的生活需求，尤應著眼於維護後代生生世世的同等基本權益。要維持這種永續性的生計與生活品質，必須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三大基礎。在提出的實際案例中，我們發現這三者不一定衝突，甚至可互為輔助，同時我們也見識到民間力量的不可忽視，應將民間社團視為永續發展的種子，讓這個看似遙遠的願景在地生根，成為社會的基本價值所在。

五場說明會中，我們見到民間與政府的直率交流，感受到民眾熱情參與的意願。一些外地前來的民眾甚至連連抱怨為何不到其他縣市舉辦說明會，因為他們覺得確實有其必要。這一系列的論壇只是個開端，未來在民間力量的參與之下，將可逐步展現具體成果。

余範英

「我們身處在一個高的社會反思性當中，個人如何建構自己，將直接和更大的社會及環境再生有關」
——安東尼·紀登斯，一九九四

壹、前言

近年來「永續發展」一詞在修辭學、大眾傳媒、及公共政策上廣被使用，但永續發展是否已成為「一個理念、各自表述」的爭議性概念，則值得吾人警惕。永續發展最廣為接受的定義是：「滿足當代的需要，且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會」，然而當永續發展概念被濫用而導致混淆的時候，我們至少必須瞭解的是永續發展概念中有許多重要領域會呈現交互影響的關係，這些領域是：環境、社會、經濟、以及影響這些領域的體制；也就是「生態、生活、生產、體制」的「三生一體」。

貳、永續性未來：典範移轉之必要

邁向永續性的必要顯而易見，就台灣的永續策略而言，必須在尋求所有人民生活品質滿足的同時，縮小其生態足跡；質言之，永續性規劃便是處於永續性兩難之

間的動態規劃。永續願景既然取決於社會對永續性兩難的廣泛認識，永續性觀念的提倡，便需徹底改變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及應用，也需克服社會大眾認為「簡化論」及「斷章取義」可以應付所有挑戰的幻覺。因此，人們不應僅侷限於知識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發問及實踐。當我們意識到人類的



◆「民間永續教育論壇」在全場巡

現況及其對未來的影響，會讓我們思考以下的問題：引導我們作決策的模式是否和自然資本相容？目前的決定究竟是創造資產或負債？那些改善生活品質的作法危害了生態環境的完整性？如何使個人的成功和永續性相容？以現況及永續性願景而言，究竟誰贏誰輸？

永續性願景的真正意涵乃在於以「新環境典範」取代「主流社會典範」，也就是必須作到全面性的「典範移轉」。但主流的永續性往往只達到一部份的典範移轉：或是只強調環境的友善度或改善度，或是只強調社會經濟效益的集體性，這些都是不完全的典範移轉，都不能符合真正永續性所追求的

「滿足當代的需要，且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會」之最終目的。

參、在典範移轉的時代中學習

典範移轉讓我們得以重新解讀發展的本質。永續發展一詞在政治上被濫用的程度，已幾近氾濫成災，這個字眼常被用來為「不永續成長」政策塗上綠色底襯，最常利用這種手段，便是那些主觀認為「三生一體」只需在適當水平作決策，而不是在最基層作決策的人。而「社區營造」這個字眼也同樣愈來愈像是陳腔濫調，彷彿任一群人的活動皆可冠上社區營造之名。但如果透過「生命週期分析」來解讀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的關係，

社區營造其實是達成永續發展真正目標的必要組成，也是終身學習的場域。

真正的經濟不僅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而是從生產的前階段之資源取得，以至消費的後階段之廢棄物處置的全面關照，而社區營造的永續性動力即在於打破原有的市場經濟邏輯，使人類在整個生命週期過程中的角色，不再是純粹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而透過群體的改造與學習，參與促成生命週期的最有效循環。

一、社區營造的參與無法被訓練，只能透過學習

在典範移轉的過程中，訓練並不是適當的作法，理論上，訓練者希望將自己的專長移轉到被訓練者的身上，

然而學生往往會忽視老師所知道的。有經驗的個人嘗試去發展、分享、及反應他們的知識，不應該建立在被動式的「被訓練」。利用專業分享的知識來計畫及營造時，其他主角及居民便必須透過「作中學」、「反思」及「研究」的方式使其動員起來。學習也意味著教導，它是一個共享的活動，不管正式的教導者和學習者之間的年齡、經驗、或知識之差異。

二、態度、知覺、語言

態度、知覺、及語言往往決定了我們所看到的，而由於語言會反應並強化這種關係，要達到典範移轉便必須包括文字及文法的改變。當然，如果沒有共通的語言，



迴參與五場說明會，圖為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王進發理事在東區說明會，說明九寮溪復育的情形。



◆民間永續發展教育論壇，李永展教授進行北區總結報告。

團隊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語言依賴舊典範的字眼時，這些語言便成為專業術語。

套裝知識或奧秘語言所圈圍的世界成了非專業者難以逾越的禁地，但如果因為專業字彙的門檻而限制甚或排除了與其他人之間的思想及溝通，長期而言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討論地方發展時，由於我們已身處在「高社會反思性」當中，因此不僅必須作一個「反思的」專業者，也必須作一個「參與式的」專業者。

當面對霸權的專業者之獨裁心態時，我們不能放棄專業的責任——惟有體認到「圈內」與「圈外」的知識是互相依賴時，存在於「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鴻溝才能消弭，而共同學習與合

作的道路才能更寬廣。

三、整合的架構之建議

在發展理論及實務的背後，有些架構是值得探討的，因為知識便是在這些架構之下被追求的，當這些架構改變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他們所包含的不僅是觀念而已，也包含價值、技術、及計畫在內，因此整合的架構不僅是跨學科的理论整合以及相互援引，更需落實為積極的實踐策略。

「在全球環保政策上領先的國家，其經濟狀況也較好」，而「理性的環保政策會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指標」，可見「環境與發展」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重要的是如何透過理性與反思的對話，提出「以少換多」的作法，方能同時達到環境及發展互利共生的永續性願景。

肆、結論

「據我所知，維持社會安全的最終力量，就是人民本身。如果我們認為民眾不夠理性、開化，因而無法做出謹慎的決定，其解決之道，並不是因此而不讓人民做決定；而是要告訴他們充分的資訊，好讓他們做出正確的抉擇。」

湯瑪斯·傑佛遜於1820年9月28日寫給威廉·查理士·賈維斯信函的內容

上述這些論述對未來進步的生態政治提供了什麼樣的省思？被解讀為數年來環境運動主義的自然產物，永續性的論述可被視為一個可以有更多基進干預的推論場域。永續性概念看起來至少認知到必須要有制度改變並將非資本主義的評估標準納入規劃過程中。在原則上，

永續性意義因此可更深化以融入社會／生態改革的元素及國家民主化的步驟；在實務上，深化「永續性」論述的可能性有賴於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在全球經濟再結構的意涵及城市競爭的壓力下，永續性策略將會在跨國積累的目的下，使地方的生態具體化程度增加。

永續性既然是一個大家共同追求的願景，其論述過程便應避免如瞎子摸象般以偏概全，面對各種不同的闡釋與解讀，我們一定要清楚分辨壓制性的、斷章取義式的「簡化論」及新自由主義策略，並且以民主的、寬廣的「宏觀論」及基進改革主義策略取代。一言以蔽之，永續性策略的精髓正如愛因斯坦的名言：「聰明的人絞盡腦汁去解決問題，而有智慧的人則避免產生問題。」這句話或許值得大家更認真地體會。（作者為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